

传统村落总体布局的自然智慧和社会语义

Natural Wisdom and Social Semantics of Overall Layou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杨贵庆 蔡一凡

文章编号1673-8985 (2016) 04-0009-08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献标识码A

摘要 传统村落总体布局对自然条件的综合运用及其所要表达的社会语义是一个整体。其总体布局的自然智慧主要体现在安全防灾的系统思维（包括避免自然地质灾害、治水防洪和理水排涝、蓄水防旱和储水消防等）、生存资源的可持续获得（包括耕地资源、水资源、阳光与风道等），以及注重对生命过程的整体性认识。传统村落总体布局的社会语义在“区域”上体现了宗族精神追求，在“边界”上反映了对领域感的集体认知，在“地标”上体现了社会控制和教化作用，在“路径”上体现了村落的社会秩序，在“节点”上塑造了村落日常生活的归属感。进一步理解传统村落的整体价值，对传统村落整体空间格局予以整体性积极保护，同时把优秀传统村落作为当今城市设计的研究和学习样本。

Abstract The overall layou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contains comprehensive use of natural conditions and its social semantics as a whole. The natural wisdoms of villages' overall layout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thinking of the safety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systems (including the avoidance of natural disaster, flood management and water drainage, water storage for drought and fire protection, etc.), sustainable access to the survival resources (including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water, sunlight and fresh wind, etc.), as well as focusing on the integrated understanding of life processes. While the social semantics of villages' overall layout reflects the clan spiritual pursuit in the "district", reflects the collective awareness of a sense of domain in the "edge", reflects the social control and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the "landmark", reflects the social order in the "path", and shapes a sense of belonging of the village's daily life on the "node". The purpose i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integrated valu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o positively preserve overall spatial patter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also treat tho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villages as samples of research and study for today's urban design practice.

关键词 传统村落 | 总体布局 | 自然智慧 | 社会语义

Key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s | Overall layout | Natural wisdom | Social semantics

作者简介

杨贵庆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蔡一凡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硕士研究生

1 问题的提出

如果比较一个现代城市居住小区和一个传统村落的总体布局,也许我们不难发现后者的空间形态更加丰富多样和耐人寻味。通过把其中的建筑 and 空间场地进行“图底互换”,则可以明显看到后者不仅具有建筑本身(“图”)单元完整性的特点,而且建筑所围合或界定的空间场地(“底”)同样具有较好的完整性。这标志着传统村落外部空间的功能和秩序具有某些潜在而深刻的含义。如果我们把传统村落

建筑称为其中的一半,而空间场地称作“另一半”,显然,这“另一半”不是因为造完建筑实体之后而随便剩余的,而应该是结合建筑实体并考虑空间场地的功能和意义而一并完成的。正如老子论及“凿户牖以为室”所说:“当其无,有室之用”。那么,这“另一半”的“无”是如何被界定和建造的呢?

关注空间场地这个“另一半”,让我们进一步思考传统村落的总体布局。拙作“我国传统聚落空间整体性特征及其社会学意义”^[1]初

步归纳了传统村落空间的整体性特征,即:(1)它与自然环境条件的协调性;(2)居住与生产活动空间组合的有机性;(3)建筑群体空间形态的聚合性;(4)公共中心场所的标识性。同时,该文还尝试建立整体性特征和社会学意义的关联。本文将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传统村落总体布局所蕴藏的自然智慧及其所要表达的社会语义。毋庸置疑,只有我们深入了解了传统村落总体布局背后的自然智慧和社会语义,才能够有助于开展传统村落整体空间格局的保护和利用,避免在保护和利用的过程中破坏了传统村落历史文化遗存。

在这里,我们把“传统村落”定义为“在传统农业社会背景和手工生产条件下小规模建造的人居环境类型”^[1]。传统村落的总体布局是指传统村落本身与周边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村落内部的建筑与空间场地的关系。“自然智慧”是指传统村落总体布局所考虑的人类生产生活与大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而“社会语义”是指传统村落总体布局所要表达的社会秩序、场所精神和集体认知。

2 研究进展

关于传统村落总体布局的“自然智慧”和“社会语义”的研究,长期以来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一个热潮。1990年代初,“中国民居学术会议”出版了五辑《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从气候条件、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对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2]。从大量的民居调查和整理中,学者开始从单个传统民居建筑研究转向对民居建筑群乃至整体村落的关注。例如,王文卿(1990)^[3]在“民居调查的启迪”指出:“村落中的民居建筑……具有明显的共同点,却面目各异,通常把这些差异现象宏观地归结于地理气候、环境位置的影响,文化类型(宗教、民族)的影响和文化传播的影响。各地村落的进口处都有类似标志性建筑物,或桥、亭;或阁、楼;或牌坊、塔;或广场等。这不仅是村落的标志,而且是人们共有的

一种意识的反应……村落的总体结构是人们所共有的一种意识,一种观念和一种文化现象。”彭一刚(1994)^[4]从传统村落的形成过程研究其景观环境的特征,指出由于各地区气候、地形环境、生活习俗、民族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导致了各地村镇聚落景观的不同。

在对建筑美学和文化关注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展关注传统村落丰富的生态学意义和社会学内涵。例如,魏挹澧等(1995)^[5]针对湘西城镇和乡土建筑进行系统研究指出“村落形态是广义的自然、经济、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各个民族对生活和真理的不同看法的外部表现”,并分为“河溪——村镇的血脉”、“路径——村镇的纽带”、“街巷——村镇的骨架”3个方面阐释了村落形态的总体布局结构。仲德昆(1996)^[6]《渔梁(徽州古建筑丛书)》前言中指出“徽州古代村落的聚落选址、整体布局、水系结构以及民居单体的结构、空间和建筑材料的选用,均体现了依山就势、因地制宜、相地构屋和就地取材的基本思想”,徽州古代村落民居是“社会生活的物质载体,具有深刻的社会学内涵”,并指出“研究的目的是对它们的环境、社会和文化背景以及设计手法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作为当代建筑创作的参考和借鉴”。刘沛林(1997)^[7]《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环境空间》在对传统村落的选址、布局、意境追求和景观建构等方面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天人合一”和“人与自然”的朴素思想在“和谐的人聚环境空间”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龚恺等(2000)^[8]《晓起》把传统村落空间特征和社会内涵进行对照研究,对族谱内重要人物和“龙灯”象征意义等社会学要素进行了讨论,阐释了徽州这一传统村落空间的成因。刘森林(2011)^[9]从社会机制和控制的视角,研究了我国民、清、民国以来的国家、地方、乡绅、商贾等对传统村落空间的影响,以及“乡规民约的控制及维护、运行与控制模式”。李秋香(2002)^[10]基于我国10个较为典型的传统村落,从历史、文化、经济和行政管理的视角,开展了大量乡土建筑的调查,综合研究了村落的特征和建筑风格,发表了《中国村居》等一

系列专著。陈志华等(2003)^[11]研究指出“聚落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定形的,这个定形过程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孙大章(2004)^[12]系统梳理了我国传统民居的建筑历史发展脉络和类型特征。单德启(2004)^[13]从传统民居地域文化的发展演进,论述了传统民居建筑再生的途径和方法。

近年来,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发展战略的实施,国家层面把传统村落保护和利用、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村落的工作提升到生态文明的新高度^[14,15]。当前有关我国传统村落生态智慧的研究和讨论在学界深入开展。对传统村落空间整体性特征及其社会学意义,以及社会变迁视角下历史文化村落再生开展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1,16,17]。

总体来看,学术界的研究从起初专注于传统村落民居建筑单体测绘、结构和材料研究,发展到对传统民居建筑美学、建筑文化、建筑空间群体、村落街巷空间、村落总体布局等研究,再进一步拓展到村落生态环境、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社会学内涵,外延不断扩大。研究的发展过程和成果揭示了我国传统村落丰富的建筑文化、自然智慧和社会语义,因而,传统村落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对象,成为我国乡村人居环境规划研究领域的瑰宝。

以下本文将选择传统村落的总体布局与自然环境关系及其所要表达的社会结构秩序两个方面,来尝试归纳先民建造村落过程中若干重要的自然智慧和社会语义,并阐述对我国当前传统村落保护和利用的若干启示。

3 传统村落总体布局的自然智慧

我国各地保存至今的传统村落,虽然因自然条件和民族文化差异显现出不同类型和特色,但是其总体布局的特征却呈现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如果借用Kevin Lynch(凯文林奇)城市意象五要素来评述一个传统村落的总体布局,那么可以说,它的区域(District)风貌完整、村落边界(Edge)清晰、地标(Landmark)特征显著、路径(Route)结构明确、节点(Node)多元丰富。从今天的评价来看,它应该是城市设

设计的优秀作品。然而,深入分析村落的总体布局,可以看到这些表象的特征并不是单纯美学的结果,而是超越美学的自然智慧的运用,其重点包括:安全防灾的系统思维、对生存资源的可持续获得,以及关于传承繁衍生命过程的整体性认知。在当时农耕时代生产力条件下,这些智慧的运用是对于自然环境条件最恰如其分的利用和改造。

3.1 安全防灾的系统思维

(1) 避免自然灾害

一个传统村落的选址最为基础的思考莫过于“安全”这一原则。即考虑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地形地貌、气候条件等对生产和生活的安全性和适宜性,从而能够避免山体塌方、水流冲沟、山洪侵袭等自然灾害。特别是防洪的考虑,成为考验一个传统村落是否可以安全、长期延续的重要标准。在先民的建设实践中,由于未能抵御自然灾害的冲击而被整体破坏的村落没有能够传承下来,而能够传承至今的那些上百年的传统村落,至少在抵御自然灾害侵袭这方面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因此,传统村落关于安全选址的朴素智慧,值得当今城乡规划建设学习。

然而,违背这一基本原则的现象在当今我国一些地区村庄建设过程中仍然发生。虽然如今我们编制城乡总体规划过程中必须考虑“建设用地评定”,村庄建设选址必须考虑“适宜建设”或“适建区”等要求,但是由于认识上的不足或侥幸心理,村庄建设仍然忘却了“选址安全”这一基本原则。例如,2008年汶川地震中一些被山体塌方几乎全部覆盖的新建村庄、“农家乐”等,由于选址不当,被塌方“包饺子”似的掩盖。又如,2016年夏我国不少地区发生严重的洪涝,不少在行洪区域内的新建村庄受到侵害。上世纪50年代大兴水利设施、建造水库大坝所预留限制建设的泄洪区和行洪区域内,由于半个多世纪没有发生安全隐患,人们似乎已经忘却了防范的警惕性,陆续在行洪区内发展建设村民住宅,而一旦突发灾害则村民人身和财产安全损失将会十分惨重。在反思灾

害的过程中,应该学习传统村落的朴素智慧,更要加强对新建村庄选址安全这一基本原则的认识,而不是只要有空地都可以建设的。

(2) 治水防洪和理水排涝

虽然传统村落的选址需要避开洪水灾害的直接冲击,但是村落的生产生活又无法远离水源,这使得传统村落的总体布局特别关注“理水”。理水是一个系统思维,即需要防范水患,又需要利用水源。在安全防灾方面,理水主要指治水防洪和理水排涝。传统村落的治水防洪通常与农业灌溉有机结合形成系统思维。著名的四川都江堰水利工程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它是区域总体规划布局的典型范例。安徽渔梁坝500多年来为渔梁传统村落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它既保障了农田灌溉,又保证了村落内的地下水水位。在水网地区传统村落的治水防洪,通过外河、内河、水闸调节、水网相连、疏浚河道等治水防洪和理水排涝的综合方法,保障了生产、生活的安全,形成了独特的水网地区传统村落的风貌。

山区传统村落的总体布局思考与理水排涝的理念也几乎一致。在用地十分有限的条件下,山区有的村庄选址不得不靠近山体。除了必须避免山洪的冲击而选址于相对的高地外,还要防止强降雨形成的山体汇水对于村落的侵袭。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村落总体上布局了顺着地势坡向的一组次要街巷,将山体来水迅速引导出村落至低处的大河溪,这样可以在强降雨时迅速排水而避免形成涝灾。图1是浙江黄岩西部山区屿头乡沙滩村总体布局中的街巷结构,反映出理水排涝的朴素智慧,即通过街巷空间形成泄洪通道,减小了台风时期洪涝灾害的影响。因此,可以看到,分洪、分流、因势利导、综合利用等方法,成为传统村落总体布局中治水防洪和理水排涝的重要智慧。

然而,治水防洪和理水排涝这一朴素的自然智慧却被如今一些新建村庄忽视了。也许是受益于现代工程机械的便利和排水管网敷设,新建村民小区更多依赖排水管网而不太关注利用自然地形地貌特征。由于受限于管网管径以及垃圾堵塞等原因,暴雨时节往往造成涝灾。



图1 浙江黄岩西部山区屿头乡沙滩村街巷与沟渠排水的一致性

注:图中绿色为主要街巷,蓝色为沿街巷的沟渠。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2 安徽歙县唐模村口展示的水渠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8]。

(3) 蓄水防旱和储水消防

传统村落总体布局中对于蓄水防旱和储水消防也可谓匠心独运。在农耕时代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条件下,传统村落难以通过有效手段防止大面积和长时间的干旱,不能像今天这样可以通过水库建设、区域用水调节和人工降雨等方法来克服旱灾。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先民积累了一些实用方法融合在村落总体布局中。例如,村落内大水塘的布局。利用自然地形低洼的地方,因地制宜地挖土成塘,通过水渠引导补水,或通过地形高差形成活水流动的水塘。这些水塘布局一方面作为日常洗涤和饮用水的及时补给,另一方面也可作为村落消防灭火的水源(图2)。

而在一些山地传统村落,由于地形复杂、平地十分有限,人工沟渠难以蓄水,更难以形成诸如平原地区村落的大水塘。先民们则采用制作大水缸储水的方式来预防旱灾和消防灭火。大水缸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在一些山地传统村落中,可以看到每家每户在房前屋后的明显地方设置储水容量较大的水缸,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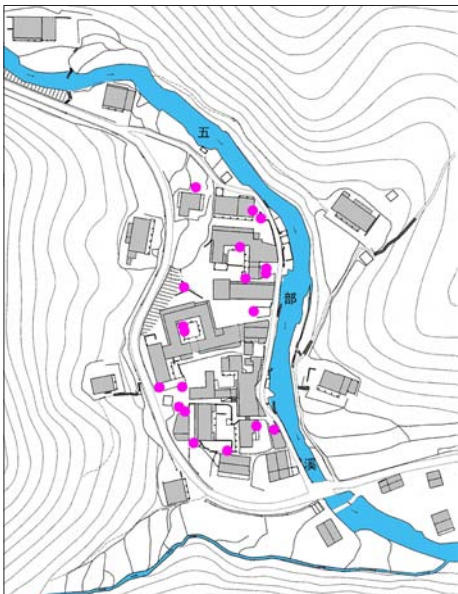


图3 浙江黄岩西部山区宁溪镇乌岩古村村民屋外大水缸分布平面图（图中红色标点为大水缸）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4 浙江黄岩西部山区宁溪镇乌岩古村村民屋外大水缸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发挥补给饮用水的作用，又和牲畜棚、粪坑冲水等结合使用，并作为应对消防灭火的重要水源。此外，间或的雨水及时得以集入水缸，凝练为朴素的节水智慧（图3，图4）。

然而，蓄水防旱和储水消防的传统做法，如今被现代化的管道供水和消防栓等设施所取代。旧式大水缸已经被村民们所抛弃。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一旦火情发生，最初的时间是控制火情的重要时机。火苗比较容易被浇灭，而通过开启消防栓、接通消防水管等一系列较为专业操作之后，也许火苗已蔓延酿成火灾。更何况普通村民还难以熟练掌握消防器材的运用方法，要等到专业消防人员赶到，也许已



图5 湘西德夯村村落住宅与山体、耕地总体布局关系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5]。



图6 浙江黄岩西部山区宁溪镇乌岩古村建筑与耕地关系图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经难以挽回损失。还不如在火情刚刚发生的时刻，从大水缸中取水灭火更为直接和有效。因此，如今在传统村落保护和利用的时候，恐怕还是不能丢弃这些大水缸以及背后所蕴含的生活智慧。

3.2 生存资源的可持续获得

(1) 耕地资源

传统村落总体布局中，耕地与村落之间有机联系并成为村落选址的重要依据。这是因为耕地作为生存资源的根本之一，是生命存在和繁衍的依赖，必须从耕作过程中获得可持续的粮食供给。因此，在步行和兽力（一般为耕牛）

适宜的距离内，需要有一片可养活族人的田地。出于对耕地资源的珍爱，一般情况下，村民将肥沃的土壤作为耕地，而将村落住宅布置在其一侧的薄地上，或依山而建。这样，村落建筑既可以节省出耕地，同时可以防止地势较低而受到洪水的侵袭。例如，湘西德夯村，将山下较为平坦开阔、邻近河床的地方作为农田，而将村落建在面朝南向的半坡上。这样不仅避免了在低洼处受到山洪灾害，同时也最大程度地利用含水充沛的土地进行耕种（图5）。虽然靠近河床的土地可能被多年一遇的突发洪水浸没，但相对于村落住宅来说损失较小。

在一些耕地比较紧缺的丘陵或山地，村落总体布局不仅需要充分利用平坦的耕地和周边的林地，而且还尽可能地在村落内部利用地形高差整理出土地耕作。例如，浙江黄岩西部山区宁溪镇乌岩古村，除了在聚落外围尽可能地利用平地 and 梯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在村落内积极利用边缘空间作为农林用地（图6）。这种在严酷条件下尽可能多地获得耕地资源，精耕细作，成为传统村落总体布局中建筑与空间场地的基本关系。

然而，传统村落与耕地的空间邻近性，现在早已被更为便利的机动性所打破。随着机械化耕作和机动车的使用，村民单位时间出行距离不断扩大，而耕地也更加规模化地集中起来。人口集中也导致城镇用地规模扩大。在一些大城市，人们远距离出行上下班已经成为常态。现代城市规划的总体布局似乎不再以居住与就业岗位的“空间邻近性”为要则，甚至一些城市新区的就业岗位和居住严重不匹配，职住分离、产城不融合等问题不断出现。大规模上下班出行导致城市交通压力增加，城市日常运行需要为庞大的（有些也不必要）出行交通埋单。基于此，有必要重温传统村落总体布局中生活与生产“空间邻近性”的朴素智慧，认真思考在居住社区层面就业岗位的有机配置。

(2) 水资源

传统村落总体布局中把理水作为首要任务，长期以来形成了一整套水资源综合利用的



图7 浙江宁海前童村落总体布局中流经家家户户的水渠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9]。

方法。在传统风水理论中“得水为上,藏风次之”显示出水利的重要性。水资源利用主要分为生产和生活用水两个主要部分。在防范洪、涝灾害的同时,把农田灌溉和生活用水相结合,是一种整体思维的智慧。一般来说,村落总体布局中会选择合适的位置筑坝蓄水、分流灌溉,同时可以保障沿溪村落的地下水水位,以便村落内井水具有可持续补水的保障。这反映出先民应对自然气候变化保障水资源安全且可持续获得水资源的重要智慧。

对于农耕生产和日常生活极为重要的水资源,成为传统村落总体布局结构形态的重要依据。对水资源的需求和使用造就了诸多依水而建的村落。村落空间格局一般沿水系方向展开,街巷与水系呈鱼骨状垂直联系,这种空间形态不仅可以使水流通过重力自然流动,而且也让村民能够以最短的路径获取水资源。在一些传承至今的优秀传统村落中,可以看到先民对水资源整理过程中体现出的安全、便捷、公平和可持续的自然智慧。例如,浙江宁海的前童古村,水系在整个村落总体布局结构中具有重要作用。乡贤组织族人开凿了一条约2 km长的引水渠,既可灌溉2 000多亩水稻田,又可引白溪水入村,源源不断流经家家户户,同时也形成了其独特的村落布局特色(图7)。当然,这种生活用水的整体水质保障,有赖于严格的

村规民约予以控制,这也反映出当地传统村落中良好的村民素质。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当今我国许多乡村地区的水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令人十分痛心。也许得益于现代机械和设备支持,一些乡村地区长距离供水管网敷设成为可能。自来水普及之后的便利性,使得村民们几乎忘却了天然水资源的珍贵。例如,不少地方村民生活垃圾随意倒入水体,村办企业排废造成了水资源不同程度的污染;村民建房的房前屋后大量使用水泥,使得地表的渗水功能大大减弱。降雨之后雨水迅速流走,无法充分补给地下水,导致在干旱时节地表水位下降。整体上看,我国乡村水资源环境品质不容乐观,应该引起各级各部门和广大群众警惕。应该把对水资源珍惜的态度与乡村文明联系起来看待,充分学习先民对于水资源的自然智慧。

(3) 阳光与风道

传统村落的总体布局十分注重建筑主要立面的向阳性。传统“风水”理论适应了我国大部分纬度区的日照规律。作为一种可持续获得的生存资源,日照成为建筑和空间场地布局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我国大部分地区传统村落民居建筑的主要朝向选择面向东、东南、南和西南方向等几个方位。在山地环境中,由于地形条件限制和可用土地十分珍贵,尽管一些传统村落总体布局的整体空间走向也会顺应溪流河道和地势,但也会把主要居住建筑面向朝阳的方位。这种顺应日照走势的总体布局,反映出先民对于日照和健康之间相互关联的认识,把人居活动和自然界其他物种生命成长规律等同考虑,把人类融入到自然界的一部分,形成“天人合一”的自然智慧。

风道(或风廊)是传统村落总体布局又一重要特征。特别是在山地丘陵地区,风道是“新风系统”的重要依托。通常情况下,一方面要考虑避免强风的袭击,利用山体地形条件给予屏障,特别是抵御寒冷西北风和北风的直接侵袭;另一方面,又需引入自然新风带走淤积的“瘴气”。因此,传统村落一侧的溪流或河道,长期的水流带动空气流动形成自然风,成为小

气候环境调节的重要资源。这种“水”与“风”互动而形成的“风水”认识,对居住健康显然是十分有益的,反映出先民在传统村落总体布局中的朴素智慧。

然而,当今一些乡村地区对于日照和新风已较少重视。特别是靠近大城市周边地区的村落,土地价值增长迅速,受房屋租赁收益驱动,村民在有限的宅基地上建屋越来越高,不顾居住建筑的日照标准。令人担心的是,如果在村民建房方面再不出台有效的法律措施,任其自然的话,那么,一旦村民可以支付电梯的使用,村民建房可能很快出现高层村民楼群。那么,合理日照资源的获得则更加困难,其结果将导致目前一些城市“城中村”的高层现象。此外,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村落水系破坏的现象屡屡发生,水体被填埋,原本流动的水体受到阻断,导致风道消失,从而降低了村落小气候的品质。

3.3 传承繁衍与叶落归根,生命过程的整体性认识

传统村落总体布局的自然智慧还体现在对人居环境生命过程的整体性认识,即对于传承繁衍的“生”和叶落归根的“死”,均作为空间场所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首先是关于“生”的思考,这主要体现在对子孙后代发展用地的预先考虑。村落先民迁居选址,期待血脉延续和家族繁荣发展之后,能够有足够的场地建造房屋,有足够农田自给自足。这种近、远期相结合的思考,是在村落选址和总体布局之初就已经被整体确定,以至传统村落历经百年生长,其整体空间场地与结构仍然显得完整和有序(图8)。因此,传统村落总体布局预设了一个不断生长的结构,换言之,其总体结构具有一定的“活性”。

其次是关于“死”的思考,即主要体现在总体布局中如何选择墓地的位置。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以来礼制、尊长以及对于死后生命轮回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墓地成为传统村落总体布局需要整体思考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样被作为“宅”来对待,是故人居住的地方,只是“阴宅”与“阳宅”的区分。在一定的文



图8 浙江浦江白马镇嵩溪古村总体布局图 (图中河溪内古村范围的整体空间结构显示出一种不断生长且完整的肌理)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化语境下,死与生虽然身隔两界,但在灵魂上仍然沟通,因此,祭扫故人是一年内十分重要的家族活动之一,也是传承文化和强化礼制秩序的物质载体。通常情况下,墓地的选址充分利用周边的自然环境条件,既要考虑到与村落居住建筑在空间上有一定隔离,又要考虑到祭扫方便。先民将“死”作为生命过程的整体性来认识,反映了“天人合一”、把人类视作大自然种群之一的思想认识。通过对“死”的空间诠释,来更好地定义“生”的场所意义。

4 传统村落总体布局的社会语义

从上文可以看到,传统村落总体布局的自然智慧反映了先人对于自然界和人类本身的认知,并通过空间结构的组织安排体现并凝固下来,从而塑造了村落环境的特征、实现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愿望。因此,总体布局蕴藏了特定的社会语义。

传统村落总体布局的社会语义十分丰富。在我国不同地区的传统村落,由于自然气候和地形地貌条件的差异,更由于地域文化(例如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等差异,村落总体布局所蕴含并传递的社会语义不尽相同。尽管如此,

通过研究可以看出其中的共性特征,例如:传统村落宗族社会的精神追求、村落领域感的集体认知、村落内的社会控制和教化的作用、对于村落内社会秩序的强调,以及村落社区归属感的营造,等等。

在这里,仍然借用Kevin Lynch(凯文林奇)城市意象理论的5个空间要素进行观察,可以发现村落总体布局的空间要素与社会语义具有一定的对应性。

4.1 区域(District):宗族的精神追求

早期有学者对浙江雁荡山脉与括苍山脉之间楠溪江古村落进行研究并指出其富有寓意的规划构思,提到其中“芙蓉村”结合自然地形以“七星八斗”规划布局,“它象征着在村落中纳入星斗来寓意魁星点斗,包容上天之星宿,人才辈出,子孙发迹,光宗耀祖”^[20];又指出“苍坡村”建村布局以“文房四宝”立意构思,“借形似笔架的远山象征笔架,在村前区引水开池象征为砚,池边摆设长凳象征为墨,设平行水池的主街象征为笔(故称笔街)”。这个总体布局结构寓意着村落人文荟萃、注重耕读文化传家的社会语义。



图9 浙江黄岩西部富山乡半山村村口路廊具有领域感集体认知的作用
资料来源:王祯摄。

因此,从区域层次上看,传统村落总体布局结构与周边山水自然环境的呼应关系,从一开始就融入了特定的社会语义。总体层面的规划设计和建造结构由此确定下来。尽管后来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村落用地规模发生变化,但是在区域层面的总体布局结构仍然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从今天城市设计视角来看,这种稳定性不仅造就了传统村落的整体风貌特色,而且更重要的是其空间表象下蕴藏着村落宗族精神追求和文化遗产的内在本质。对于这一总体布局特色和价值的认识,有助于科学合理开展当今传统村落保护和利用工作。

4.2 边界(Edge):领域感的集体认知

传统村落的边界具有较为明显的物质空间提示,例如村落周边的自然河道边界、山体边界,村落入口处的大树(有的被称之为风水树)、路廊边界、村落入口的桥梁、牌楼等。这些边界物质要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语义,是村落领域感的集体认知(图9)。

村落边界的集体认知有的时候具有十分重要的宗族意识。例如,陈志华等著的《新叶村》对其水渠作为村落边界的重要性做了深入的研究^[11],指出新叶村内渠作为村子命脉而成为村落的边界,宗祠专门规定“叶姓本族的成员,房子都造在双溪环抱之内,不允许造在双溪之外。叶姓族人,凡死于双溪之外的,不能入祠停厝,归葬祖莹。另一方面,外姓人,除了铁匠和剃头匠之外,一律不许暂住在双溪之

内。”这个双溪河道边界“保护着宗法制度下血缘村落的单纯性”，它“不仅仅是地理性的，更重要的是社会性的、心理性的”^[11]。

4.3 地标(Landmark): 社会控制和教化作用

地标是传统村落视觉环境中几乎从各个角度都可以看到的人工构筑。它们通常都具有一定的高度或体量，位于村落总体布局结构中十分重要的位置，同时，其功能也具有相应的特殊性。一般来说，作为传统村落地标的构筑包括塔、阁、钟鼓楼、庙宇等宗教建筑或其他公共建筑。无论是风水影响、宗教仪式或精神伦理的寓意，它们都标识并传承着村落的社会语义，起到社会控制和教化作用，是村落社会稳定和精神追求的物质载体。

地标建筑的功能、位置和作为视觉控制作用的一致性，是传统村落总体布局结构中的重要特征之一。例如，在广西桂林三江八协寨的村寨较大建筑密集，但鼓楼以其体量和特定的造型，作为全村寨的公共活动中心和视觉中心始终控制着村寨总体结构。它承载了村民举行丰收、祭祀等节庆活动的功能，从而成为整个村寨的社会中心，具有神圣的控制力量和教化作用（图10）。又如，浙江建德新叶村的文峰塔，在村落建筑水平方向延展的视觉环境中独树一帜。虽然其造型纤巧、体量不大，但是由于它的高度和位置，垂直向上的形态打破了水平方向的天际轮廓线，从而成为视觉中心（图11）。文峰塔作为村落的地标，诠释“耕可致富、读可荣身”的价值观和理想教化。

4.4 路径(Route): 从空间秩序到社会秩序

主体街巷空间结构往往是传统村落总体布局结构中又一个比较显著的特征。主体街巷是指村落中主要的街道和巷道，作为村落内部交通、公共空间和村民住宅建筑的主轴。在街巷主轴串联的公共建筑及其形成的公共活动空间，往往是村落最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所在。村落的祠堂、庙宇和开敞的空地一般在主街空

间上，成为宗族祭祀活动、节庆活动、宗教仪式等社会活动的物质载体。传统村落长期形成过程中，尽管规模和空间形态增长或变化，但是街巷主轴的格局及其所形成的空间秩序基本保持稳定。这一稳定的空间秩序支撑了村落的社会活动，从而保障了村落的社会秩序。

传统村落中的“路径”既是两侧建筑完型之后的结果，同时又是定义两侧建筑空间距离的主要依据，从而承担了村落规模有序增长控制要素的角色。在一些规模较大的传统村落，主体街巷空间随着村民住宅增加而成网络状分布。村落总体布局结构从单中心向多中心扩展过程中，主街形成两条或者更多条路径走向。即便如此，在主要街巷空间分布和串联的仍然是诸如祠堂、埠头等村落的公共设施 and 场地，形成一种类似“分形”的结构，如同植物枝叶有机生长的过程，局部和整体关系始终保持着相似性。这种空间秩序整体结构相似性的表象背后，反映的是生产关系和社会秩序的逻辑。因此，传统村落总体布局中，空间秩序和社会秩序具有一致性。

4.5 节点(Nodes): 日常生活与归属感

节点是指村落内部重要的公共设施与场地。例如，村落的宗族祠堂、私塾、学堂、书院、茶馆等店铺、埠头、桥梁，以及亭、台、楼、阁、塔等各种公共活动设施和场地，它们承载了村民的日常生活，是村落社会生活的发生器。

正如前文所述，传统村落的节点空间不是村民住宅等建造完型之后“剩下”的，相反，它们是与住宅等建筑之间功能关系互动的结果。这种规划设计方法，既考虑到住宅等建筑功能，同时又考虑场地的活动使用要求，是“图”与“底”的有机统一。用来限定公共活动空间节点的周边建筑，一般是具有公共活动和开放空间的特点，并且由村落街巷的主街“路径”串联，为村落社会生活提供了可达性和便捷性。

传统村落节点空间所发生的活动往往是村民日常生活中必须的内容。例如，在水网地区的村落环境中，埠头是日常生活交流的重要



图10 广西桂林三江八协寨鼓楼地标的控制作用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21]。



图11 浙江建德新叶村文峰塔地标在天际轮廓线的视觉控制作用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1]。

场所。村民直接在埠头和船家发生买卖，甚至买卖活动延伸开来，形成村落的集市。又如，在一些平原地区的传统村落中，取水和洗涤是日常生活中的必要活动，因此，水井或水塘成为村民交往的重要场所，村落中“家长里短”信息通过日常活动交流而扩展开来。这些空间节点成为村民日常生活重要组成部分，增强了村落公共空间的共享和归属。

5 结语:对当前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几点启发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传统村落总体布局对于建筑之外的空间与场地的“另一半”来说，是一个整体对象的辩证的两个方面，它们互相支撑、互为因果。换言之，传统村落总体布局过程中，对自然条件的综合运用及其所要表达的社会语义是一个整体。物质形态的作用不仅具有物质功能，而且也是社会性的。物质空

间形态成为表达社会秩序和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利用物质空间建构,主观、能动地推进社会建构。运用自然智慧,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传统村落的社会语义,促进家族聚落的和谐发展。

对于当前各地开展的传统村落保护和利用,可以获得以下几点启发:

(1) 进一步理解传统村落的整体价值,提升认知水平。传统村落蕴含着丰富的规划建造的哲理,需要加以研究、挖掘和整理,从而获得关于传统村落保护和利用的科学认识。

(2) 对传统村落整体空间格局应予以整体性地积极保护。包括传统村落的外部重要的自然地形地貌,周边水系环境和村落街巷空间等,提炼其整体空间结构,传承其规划建造的精髓和本质。只有这样,才能提升当今保护和利用传统村落工作的水平。

(3) 传统村落亦可当作如今城市设计的样本予以研究和学习。深入分析传统村落发现其丰富多样的表象之下社会语义的逻辑,其建造哲理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当今规划设计的理念。因此,传统村落总体布局自然智慧和社会语义的内涵,可以认为是中国特色城市设计理论的雏形。■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Academic Conference (Vol.1)[M].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1991.
- [3] 王文卿. 民居调查的启迪[J]. 建筑学报, 1990 (4): 56-58.
WANG Wenqing. Reflections on human settlements research[J]. Architectural Journal, 1990 (4): 56-58.
- [4] 彭一刚. 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4.
PENG Yigang. Landscape analysis of traditional village settlements[M].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1994.
- [5] 魏挹澧, 方咸孚, 王齐凯, 等. 湘西城镇与风土建筑[M].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5.
WEI Yili, FANG Xianfu, WANG Qikai, et al. Towns and architecture in Xiangxi[M]. Tianjin: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1995.
- [6] 东南大学建筑系歙县文物管理所. 渔梁[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1998.
School of Architecture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Yuliang village[M]. Nanj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1998.
- [7] 刘沛林. 古村落: 和谐的人聚环境空间[M]. 上海: 三联出版社, 1997.
LIU Peilin. Ancient villages: harmonious agglomeration space[M].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 [8] 龚恺. 晓起[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1.
GONG Kai. Xiaochi village[M]. Nanjing: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2001.
- [9] 刘森林. 中华聚落—村落市镇景观艺术[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1.
LIU Senlin. The settlement landscape of Chinese villages & towns[M].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2011.
- [10] 李秋香. 中国村居[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
LI Qiuxiang. Chinese villages[M]. Tianjin: Bai 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2.
- [11] 陈志华, 楼庆西, 李秋香. 新叶村[M]. 河北: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CHEN Zhihua, LOU Qingxi, LI Qiuxiang. Xinye village[M]. Hebei: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3.
- [12] 孙大章. 中国民居研究[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
SUN Dazhang. Research on human settlements in China[M].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04.
- [13] 单德启. 从传统民居到地区建筑[M]. 北京: 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 2004.
SHAN Deqi. From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to local architecture[M]. Beijing: China Building Materials Press, 2004.
- [14] 仇保兴. 生态文明时代的村镇规划与建设[J]. 中国名城, 2010 (6): 4-11.
QIU Baoxing. Tow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in the era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J]. China Ancient City, 2010 (6): 4-11.
- [15] 夏宝龙. 美丽乡村建设的浙江实践[J]. 求是, 2014 (5): 6-8.
XIA Baolong. Zhejiang practi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village[J]. Qiushi, 2014 (5): 6-8.
- [16] 杨贵庆. 从“住屋平面”的演变谈居住区创作[J]. 新建筑, 1991 (2): 23-27.
YANG Guiqing. Residential district design from the evolution of housing layouts[J]. New Architecture, 1991 (2): 23-27.
- [17] 杨贵庆, 戴庭曦, 王祯, 等. 社会变迁视角下历史文化村落再生的若干思考[J]. 城市规划学刊, 2016 (3): 45-54.
YANG Guiqing, DAI Tingxi, WANG Zheng, et al. Regeneration of historical cultural villag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hange[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6 (3): 45-54.
- [18] 建筑思潮研究所. 住宅建筑[M]. (日): 建筑资料研究社, 1986.
Institution of Architectural Trends. Residential buildings[M]. Japan: Architectural Document Press, 1986.
- [19] 王兴满. 走进前童[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6.
WANG Xingman. Coming to Qiantong village[M]. Beijing: China's Culture and History Press, 2006.
- [20] 何重义, 业祖润, 孙明, 等. 楠溪江古村落建筑的环境意趣[J]. 新建筑, 1989 (4): 60-63.
HE Zhongyi, YE Zurun, SUN Ming, et al. Environment interest of ancient village buildings in Nanxi[J]. New Architecture, 1989 (4): 60-63.
- [21] 李长杰. 桂北民间建筑[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0.
LI Changjie. Local architecture in northern Guangxi province[M].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1990.
- [22] 本刊编辑部.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规划”笔谈[J]. 城市规划学刊, 2014(5): 1-6.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Urban Planning Forum. Special Interview: New Urbanization and Urban Planning[J]. Urban Planning Forum, 2014(5): 1-6.
- [23] 蔡昉. 破解农村剩余劳动力之谜[J]. 中国人口科学, 2007 (2): 2-7.
CAI Fang. Myth of the rural surplus laborers[J]. Chinese Population Sciences, 2007 (2): 2-7.
- [24] 仇保兴. 如何转型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问题[J]. 时代建筑, 2013(11): 10-17.
QIU Baoxing. How to manage transforman Core issues focused on China's new urbanization[J]. Time Architecture, 2013(11): 10-17.